



——记录人的记述

吴松营◎著



邓小平

南方谈话实录

——记录人的记述

吴松营◎著

 人民出版社

统 筹:任 超 宋军花

责任编辑:宋军花

责任校对:吴海平

装帧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记录人的记述 / 吴松营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1

ISBN 978 - 7 - 01 - 010722 - 6

I. ①邓… II. ①吴… III. ①新闻报道—中国—当代 IV. ① I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2053 号

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

DENGXIAOPING NANFANG TANHUA ZHENQING SHILU

——记录人的记述

吴松营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25

字数: 156 千字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10722 - 6 定价: 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 001/ 第 一 章 生气恃风雷
- 007/ 第 二 章 深圳奏响《世纪行》
- 017/ 第 三 章 题写没有“站”字的深圳站名
- 025/ 第 四 章 深圳盼来小平“世纪行”
- 030/ 第 五 章 到深圳就坐不住
- 041/ 第 六 章 全程记录的重任
- 045/ 第 七 章 八年前的故事
- 058/ 第 八 章 国贸大厦鸣春雷
- 069/ 第 九 章 老百姓见到真人
- 073/ 第 十 章 评语是“不走调”
- 080/ 第 十 一 章 记录工作险些出娄子
- 084/ 第 十 二 章 发言人“擅”讲真话
- 090/ 第 十 三 章 融乐华侨城

- 098/ 第十四章 就是“政策”两个字
- 102/ 第十五章 仙湖植物园妙趣横生
- 108/ 第十六章 未上弘法寺
- 113/ 第十七章 并未“得罪了多数”
- 120/ 第十八章 “不破例”和“快一点”
- 133/ 第十九章 好像邓小平未曾来过深圳
- 136/ 第二十章 绕不过去的道
- 140/ 第二十一章 大胆变通的“破例”
- 146/ 第二十二章 令人焦虑的“平静”
- 151/ 第二十三章 一个电话——春风已度玉门关
- 157/ 第二十四章 邓小平上了卫视
- 161/ 第二十五章 催生了一本畅销书
- 164/ 第二十六章 一幅画像成市标
- 172/ 第二十七章 《历史的抉择》
- 178/ 第二十八章 猜不透的内情
-
- 187/ 后 记 求索路漫漫
- 190/ 书后语

第一章

生气恃风雷

1989年是国际风云变幻的一年。人们不会忘记，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一场共和国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风波。它震动了中国，震惊了世界。对于那个“多事之秋”的年代，恐怕每个历经其时的中国人都记忆犹新。

人世间发生的事情及其因果关系，有时候会比自然界不知复杂多少倍。一场政治风波，其起因往往像大海上强台风的形成，开始或许不为人察觉，但在风平浪静中已经孕育着可怕的力量。或许，善良的人们凭着朴素的愿望是要推动中国的改革，要反腐败，渴望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是，事态演变最终却事与愿违。它差点让中国这艘大船在改革开放的航道上迷失方向。惊心动魄的风波过后，扑朔迷离，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重新成了党内、国内人们普遍关注、乃至国际社会议论的焦点。

世界形势走向，此时却令西方大国的政治家们越来越乐观。甚至有人堂而皇之地断言，事变即将发生，胜利就在眼前。他们继续开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在内的各种机器，利用一切宣传工具，企图策动中国从思想混乱走向社会动乱，国家分裂，以便从中渔利。

西方强国的意愿——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的阴谋，经过多年的蓄意策划之后，首先在社会主义的东欧不断得逞。罗马尼亚、波兰、匈

牙利等国不断发生动乱，有的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垮了，产生了“民主”政权，也有的国家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经济倒退，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急速下降。

最令世人瞩目的是，戈尔巴乔夫在 1989 年春还俨然以世界大国和强国总统的身份到中国访问，受到中国党和国家最高规格的接待。但从这一年春天立陶宛宣布独立开始，就已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1990 年 5 月，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与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关于禁止核武器扩散的协议，当他回到苏联的时候，却发现后院已经起火。苏共内部争斗激烈，民族矛盾加剧，导致民怨沸腾，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总统已经失去自己的地位和控制能力。8 月 29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暂时中止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的决议。转过年来的夏天，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亚美尼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这些昔日的亲密伙伴相继独立，最高苏维埃政权油枯灯尽，岌岌可危。终于，在那个寒冷的 1991 年的冬天，建国 70 年之久的超级大国轰然坍塌。

苏共的垮台和苏联解体，有其内部的因素，但却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长期“关注”密不可分，这一切都为后来解密的档案所证明。撒切尔夫人在她卸任英国首相之后，1991 年 11 月在美国石油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就大谈“我们怎样肢解苏联”的话题，道出了西方各国不是在军事上、而是从经济上把苏联搞垮的秘密。而在中国，西方却没能得手。在 1989 年的政治风波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领导层采取强硬的断然措施，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遭遇了美国等西方二十多国的经济封锁和“制裁”，中美关系陷入了 1972 年以来的最低点。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然不信邪、不怕鬼，保持了执政党的地位。中国政府坚决执行邓小平当时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尊严，中国国内

的政治形势很快稳定下来。

就像病人需要恢复元气，这时候的中国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在国内进一步改革开放，抓住机遇，练好内功，这样才有可能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然而，这一年下半年，国内的舆情和思潮却让人心乱神迷，情形堪忧。思想领域大谈如何反和平演变，不断提醒国人应该如何认真吸取苏联的教训，力避重蹈覆辙。一些机构也不断举办各种学习班，重点是学习和领会相关文件，主题自然是“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秋天，一份报纸发表了一封颇有来头的“群众来信”，强硬地指出：“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戈尔巴乔夫）叶（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一时间，报纸、广播、电视连篇累牍地发表各式各样的文章，批评忽视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有的还列举对外开放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成灾现象”，主题就是“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作为当前最重要任务”。按照“舆论先行”的逻辑，种种迹象表明，下一步中国很可能就要大踏步向“左”转了。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思考的问题。此时，已经以一封不足七百字的辞职信，以“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从岗位上“全退”的邓小平，他的思想并没有退休，依然充满活力，他的晚年岁月，依然闪烁着光辉。向何处去这个尖锐的问题，也同样搅动着他的思绪。面对几乎一边倒的舆论态势，他一直在冷静观察思考，当他敏锐地察觉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时，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勇敢地站了出来，力排众议，拨正船头，引导中国航船继续驶向光明的彼岸。

从1990年底，邓小平开始频频放话，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强调“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他希望新的领导班子排除

干扰，紧紧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简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强调经济“要实现适度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

这一年的三四月之后中央开了很多会议，包括全国“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委员会）、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全国精神文明工作会议、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组织工作会议。经济方面的治理整顿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发展速度明显下滑。据有关资料显示，1984年至198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五年平均增长率在10.8%，而1989年只增长3.9%，1990年也只增长5%，勉强达到中央要求。到1991年，3年间的年国内生产总值徘徊在1.5万亿元至2万亿元之间。每年实际引进和利用外资只有100亿美元左右，进出口实际上有减无增。大批国营、集体企业生产萧条，甚至倒闭，大批职工下岗。整个国营经济低位运行，近乎萧条。通货膨胀尽管从1988年近19%的高位降到了1990年的15%左右，仍然让广大老百姓喘不过气来。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指出：“比较突出的是经济效益下降，国家财政比较困难”。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再次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更突出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9页。

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1]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说是过节，但与此前休息度假完全不同，他不但视察工厂、参观企业，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的谈话。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2]

在处理变幻莫测的中美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高瞻远瞩，纵览全局，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89年11月7日至10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应邀访问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赞扬基辛格以政治家的勇气和战略性的远见，在中美关系面临困难的时刻来到北京，希望尽快结束中美之间几个月来不愉快的纠葛。邓小平、江泽民又分别会见基辛格。随后，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访问中国，邓小平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希望尽快解决半年来两国的分歧和纠葛。邓小平还郑重地请斯考克罗夫特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但是，强大的美国似乎对当时仅仅是世界人口大国中国的领导人的友好态度不屑一顾。对邓小平这位“中国退休老人”的话，同样是半句也听不进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在苏联解体、柏林围墙倒下之后，就曾经在伦敦聚会，庆祝资本主义民主的胜利，研究加快中国共产党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2—45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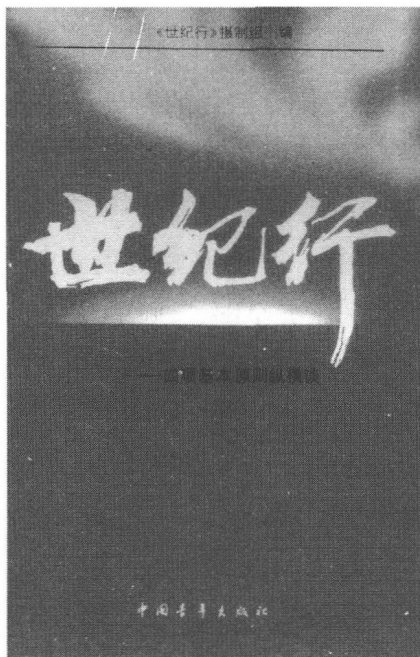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台、社会主义彻底消亡的战略步骤，动员整个发达国家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封锁和文化渗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甚至集体宣布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武器禁运。这实际上又使中国内部的某些人士在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教训中，更加振振有词地要把反对和平演变作为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力图扭转已经驶上改革开放航道的中国航船的航向。当然，也就更加谈不上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体制改革、推行市场经济，使国家的经济保持高速度增长了。面对国际国内纷繁复杂的形势，党内、党外的思想认识也一时难以统一，不可能“完全与中央保持一致”。关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姓“社”还是姓“资”、“整顿”与改革开放孰重孰轻的争论，仍然在党内、党外，在各个地方、各个阶层无休止地持续。

中国的政治生活有一个现象令人玩味，那就是小道消息满天飞，“天线很多，图像不明”，党政干部在会前会后，老百姓在茶余饭后，说的或听到的与上头文件或党报党刊的声音不大相同，有的甚至截然相左。虽然那时还没有今天网络、博客这样的舆情反映，但是却已经很明显地让人感到，人们在担心自己的处境和未来的同时，更多的是在忧虑国家的前途、命运。海外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爱国同胞、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也都忧心忡忡。广大党员包括许多高级干部，还有广大老百姓都在观望、等待……

第二章

深圳奏响《世纪行》



《世纪行》解说词封面。

在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受创伤最重的可算是深圳特区这个“改革开放排头兵”了。

深圳受的是“内伤”，是人们对政治风波以后国家、民族的严峻形势的担忧、困惑，继而是这种严峻形势使深圳特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伤。1989 年下半年之后，“深圳就是搞资本主义”、“深圳就是靠国家的特殊政策养肥的”、“深圳就是修正主义的温床”……各种批评、指责，从北京、上海乃至全国各地更加密集、更加猛烈地铺天盖地而来。

“中国将来会怎么样？”“深圳特区还能不能办下去？”外商在忧虑和彷徨之后，连同他们的资金纷纷撤

走。许多工厂停工。多数基建工地冷冷清清，那些已经竖立而又未被混凝土包裹的钢筋被风吹雨打，犹如不断地在流淌着血水。无论是海外还是内地的人们，很多都不敢到深圳来了。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之后，曾经四面八方到特区参观考察，深圳四乡八里日日有企业开张的热烈情景，影音全无了。有的酒店、宾馆的入住率不到10%。外来民工无奈地一批批回家……尽管深圳市委、市政府采取了力所能及的各种措施，使全市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1988年深圳全市的国内生产总值73.75亿元，1989年深圳全市的国内生产总值97.81亿元，1990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35.85亿元，增速约35%，仍然为办特区以来最低（从1979—1993年，深圳市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为46.5%）。两年中，全市实际利用外资还不到10亿美元。整个深圳一片迷茫，上上下下忧心忡忡，人心惶惶。

但是，深圳一批曾经抱着纯真理想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一批充满热血的中华儿女和深圳特区的拓荒牛们，却有一份匹夫之勇和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心。

深圳经济特区自成立以来，历届市委都有一个明确响亮的口号：“深圳是全国人民的深圳，全国支持深圳，深圳服务全国。”响亮口号变成一面鲜明的旗帜，化作深圳人对全党、全国、全民族的大局意识。

有一天，深圳市委宣传部杨广慧部长把我和深圳广厦文化公司的副总经理刘奇光叫到办公室，传达市委关于要理直气壮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又要在形式上做到生动活泼的指示，研究可否通过摄制电视政论片来宣传改革开放和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在讨论中，我们觉得最应该做的是，宣传改革开放是强国的必由之路，当然也必须同时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共产党执政的根本。我们的一致认识是，无论是宣传改革开放，还是宣传四项基本原则，都不能用传统的生硬说教、灌输的办法。杨广慧有一句话，叫做“要宣传改革，首先就要改革宣传。”

深圳广厦文化公司属下有一个“中国之最摄制组”，摄制了《农村改革三部曲》等好几部宣传改革开放的好片子。摄制组的负责人刘奇光原在天津电视台工作，按他的说法：“深圳爱惜人才。你只要有想法，想要做点事情，只要是正道，比较容易并且很快就能实现。”他是影视制作方面的行家，到深圳后工作干劲十足。刘奇光后来被委任为市委宣传部属下的“新闻影视中心”主任。

我于1981年从广东省湛江地委宣传部调到深圳市委宣传部长，从科长、副处长、处长到副部长，负责内宣、外宣和新闻出版工作。说实在的，如果是十几年前，还是在粤西的党委机关工作时的思想政治观念的我，很可能参加到批评经济特区、反对改革开放的合唱中间。但是，现在不能。我已经过了“四十而不惑”的中年，通过十几年参加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参加经济特区建设的实践，我看到深圳从一个贫穷落后的边境小镇飞快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大城市，老百姓生活有很大改善，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我在实践中思考，在思考中感悟，包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何真正做到与实践正确结合的思考和感悟，对政治经济学有了个人的新见解。总之，我无论是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哲学思维方式上，在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真正感情上，都发生很大变化。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冲动：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理想和履行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诺言，在困难形势面前，应该挺身而出，决不应该退缩！

杨广慧、我和刘奇光经过多次讨论研究，决定要摄制一部电视政论片，初定名为《四维规矩九州方圆》。主题思想是，既要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着力宣传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国家社会一定要安定下来，正如邓小平说的“稳定压倒一切”。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根本就谈不上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但是，单单有稳定还不行，而必须要发展，要尽快建

设四个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必须坚决地继续改革开放，把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摆到最重要位置。电视政论片进入剧本创作阶段，我们在与创作、编导和制片人员讨论时，反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一定要在讲四个坚持中，强调继续改革开放的必然和不可逆转；在继续改革开放的论述中，说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

我们三个人的分工是，杨广慧负总责，向市委主要领导汇报，以求得到市委的许可和支持，同中宣部和中央有关部门沟通，以求得到他们的支持配合；刘奇光负责总制片，而且因为摄制这么重大题材的电视片，必须长住北京筹划、制作；我负责整个摄制工作的日常事务，介于杨、刘之间。

对于电视政论片的名字，在实际创作中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在中宣部研究室领导的指点下，我们将片名定为《世纪行——四项基本原则纵横谈》。正所谓名正言顺。定了片名，电视片的主题思想、表现方式和手法也就更加清晰。我们又多次同创作和编导的专家交流，反复研究，下决心要在“纵横谈”上把文章做足做好。要通过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历史，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的发展情况，并与苏联、东欧，乃至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情况的比较，力求透彻、形象、生动地说明我们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

当时的深圳特区，各方面的人才还很缺乏。我们就“借助别人的脑袋”，到北京聘请中央党校的教授和青年教师，聘请全国知名的青年作家为该片编写解说词，请《党建》杂志社、中央电视台等单位的著名电视编导进行再创作加工和电视艺术编导，从“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聘请专业的制片骨干。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中央电视台以成本价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甚至从未面世的历史影片镜头和资料。中宣部

办公厅、研究室、新闻局对我们的工作也给予大力支持。中宣部研究室主任朱通还亲自担任我们的总策划。朱通在理论指导和帮助我们沟通更上一级领导方面，实际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具体在北京负责诚请各位专家、学者的，主要是担任总制片人的刘奇光。由于经费不足，摄制组的住宿、交通和工作、生活条件都比较差，他更不可能向专家、学者许诺会有多少经济报酬，而要靠对人的诚恳态度，自己磨破嘴皮。1990年春节前后，正是我们的摄制工作最紧张阶段，刘奇光和部分工作人员过大年也坚守工作岗位。有好多时候天寒地冻，刘奇光照样带着摄制人员，扛着机器设备，冒着鹅毛大雪去赶场景。

我被指定为《世纪行》总编辑，既然如此，就必须尽心尽责。首先必须认真向理论家们、文学家们和电视编导学习，拜他们为师，补充新的知识和电视艺术营养，跟他们友好相处，互相尊重。同时，又必须坚决按照既定的主题思想，认真注意在思想政治上和舆论导向上把好关。同时，我还是市委宣传部主管新闻宣传的副部长，电视片制作经费的问题，以及其他组织策划工作，都必须具体去解决、落实。首先是要解决经费问题。前面说了，20多年前摄制电视政论片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儿。按规定市财政也没有这项经费开支。

为了筹集制作经费，我带着刘奇光找到深房集团的董事长骆锦星，此人颇有改革开放先锋的气度。深圳在80年代冲破阻力，第一次公开拍卖土地、第一个举牌的就是这个骆锦星。他听我们详细说明情况后，立即答应支持10万元。我又同宣传部办公室商量，从下属的印刷厂、音像公司等事业单位筹借了10万元。有了这20万元，《世纪行》的摄制工作才正式启动起来。由于经费实在太紧张，摄制组的人员在北京只能住便宜的招待所，所有开支都尽量节省，但还是经常为经费不足而发愁。我们又得到处“化缘”，找深圳新华外贸集团等企业支持。



1987年12月1日，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成交现场，举牌第一人叫骆锦星。

江式高 摄

为了寓教于知识、艺术、娱乐之中，我们既充分利用深圳的条件，认真总结办经济特区以来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又千方百计地挖掘国内外珍贵的历史镜头和资料。包括通过外交部老干部与苏联大使馆的关系，在苏联国内寻找到列宁的珍贵历史镜头；派出摄制组千里迢迢到安徽拍摄小岗村农民搞土地承包的资料，到江西南昌拍摄“邓小平小道”，等等。

在创作和制作的后期阶段，我们多方面倾听各类专家、工人、市民的意见，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师生代表观看样片，吸收他们的意见。总之，是力图以生动的语言和事例，在只有160分钟、四集的电